

笔墨铸魂 德润乡邦

——缅怀乡贤焦延甫先生

□ 杜亮姝

身为深耕孝义本土文化领域的从业者，我既是焦延甫先生的曾外孙女，更有幸在文旅岗位上践行文化传承的使命。在整理地方史料、推广本土文脉的过程中，这位跨时代乡贤的品格，总能给予我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让我愈发坚定守护文化根脉、服务桑梓大地的初心。

焦延甫先生（1893—1978），名锡龄，字延甫，号益愚，孝义高阳镇三多村人。先生在《焦翁自述》中自叙：“先父应康公生余一人，愚直自用，一世无成，性之所至，于正名与字之外，因遇而感，称号颇多，如性刚称醉侠，常快称乐真子，临河居称伴石山人，喜交游称野外散人，好金石称醉石道人，乐静居称古晋逸民，名其室曰修省斋，示自悔也，年花甲称三多老人，岁七十称古稀老人，寿八旬称八不老人。”寥寥数语，既见率真性情，更显自省胸襟。

先生幼年受母教熏陶，启蒙根基深厚。正如《自述》所记：“年幼时，以父久商在外，多赖母教谨严，爱而不溺。及长，先受业于王拔贡化南姨舅馆中，由县高毕业后，复从学于先进士萼楼先生之门，又以留心学习，颇富常诚经验，深感自如。”青年时期，他先执教高村两等学校十余年，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传播新知；后历任地方要职，从义务村长到县商会主席，再到抗日前

夕出任县财政局主任，始终以“清慎勤”为立身准则，深得乡邻信赖与敬重。尤为可敬的是，日寇侵华期间，面对侵略者的威逼索财，先生临刺刀而不改色，坚守清贫气节，用刚烈正直诠释了中华儿女的民族骨气与家国大义。

在书法艺术领域，先生是民国年间孝义书坛的领军人物，与冯济川、李元晋等名家齐名。他尤擅篆隶，兼工魏碑楷书，篆书取法石鼓钟鼎，笔力雄浑健拔；隶书瘦劲通神，尽显汉魏风骨。即便年届82岁高龄，仍能以五种隶体书写毛泽东诗词，笔力遒劲、一丝不苟，被时人盛赞为“大家风度”。因热爱书法艺术，我时常临摹先生留存的遗墨与篆刻作品，而《自述》中：“前在家时，曾存有书帖字墨等八箱，自镌印章百余方，刻字木器数十件。后在京居二十年中，于节约下，又集存到金石文物，大小十一箱，刻成印章二百余块，并临成篆隶碑帖三十二本，和集联三十二册”的记述，更让我深切体会到他对金石笔墨的赤诚痴迷——这份矢志不渝的热爱，正是“醉石道人”这一称号的由来。

先生一生最浓墨重彩的篇章，是对教育公益的执着践行。据侯佑诚先生《自传》记载，1935年夏天，“那时我正在孝义振兴大会办理会场会务，同时焦延甫同志

正担任地方上的财政局长，他与我共同提倡，就得到许多人的同意，故在当年秋天，便成立了道德学社。成立的时候，因无地址，暂借了北门街张猷先生的东房三间，邀请狄楼海先生来孝义讲演提倡道德挽救人心的意义。当推冯季重、焦延甫为正副社长，张少房、孟伯寅为正副主讲，我为事务主任……”先生在《自述》中亦补充道：“抗日将临，又被选任财政局主任兼理差务，同时，又和地方人创办孝义道德学社兼任副社长，从事讲习。县城沦陷后，余即避居家中，继同县府流转西乡年余，仍又返家。待日寇退走回城，和学社同人将所办之讲习班改为完小，继又创中学自修班，及正式尊德中学等。我还在本村开办一所工读小学”。这所诞生于战乱中的学校，秉持“尊道贵德”理念，以国学为教材，坚决不开日语课、拒绝奴化，吸引了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名校毕业生慕名执教，在沦陷区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求学蓝天，前后培养初高中学子千余人，许多毕业生后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力量，文脉传承至今不息。

先生对文化传承的赤诚，更体现在“延父存古室”的创办愿景中。《自述》中他写道：“原计划再集一部篆文集古后，完全运回本县，同家中原有者，组成延父存古

室，全数归公，裨益大众，由地方推出人来，共同管理，希望永久，亦不枉我多年由艰苦得来之不易也。后家中被抄，尽数损失，无一幸存，家有者也属同然，所谓有志未逮，夫复何言。”这份“藏而不私、公之世人”的家国情怀，即便历经劫难，仍令人动容不已。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婉拒了中国考古研究所的聘约，为抚养孙辈回归家庭，却始终牵挂文化传承事业。他的一生，集书法家、教育家、收藏家、公益家于一身，笔墨间彰显文化自信，办学中诠释家国担当，藏品里饱含赤子情怀。

如今，漫步孝义老城，中阳楼见证百年岁月沧桑，青石板路印刻时光痕迹。焦延甫先生的品格与精神，早已融入孝义的文化血脉，成为三晋大地乡贤文化的生动注脚，更成为后辈履职尽责、传承文脉的不竭动力。这份跨越百年的家国情怀，必将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激励着更多人守护文化根脉、建设美好乡邦。



汾阳人宋克申事略

□ 文/图 李勇斌

1991年第一期《汾阳县志通讯》中，宋希川、雷瑞五所作《汾阳诗书世家冯姓列传》一文记载：1928至1929年间，汾州知名才子、律师冯汉在上海执业期间，时任上海医院院长的宋克申曾力邀其撰写《上海医院院记》，该书后刊行面世。

初见“宋克申”之名，联想到汾阳聂生村

宋氏为汾阳望族，人口繁盛，此人是否为聂生村宋氏后裔？身为上海医院院长的宋克申还有没有其他重要事迹？带着疑问，笔者多方搜罗史料，虽相关记载寥寥，但宋克申在淞沪会战中的救护事迹尤为突出，今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将其生平与抗战贡献梳理

成文，略作简述以资铭记。

宋克申，汾阳人，出生年未知，求学期间，他怀抱“悬壶济世”之志就读于北京某医学专门学校，学成后赴沪，就职于上海医院。上海解放后，任职于上海北站医院。宋克申深耕上海医疗界数十年，深得民众信赖与业界敬重，于1957年病逝。民国版《上海医院院记》是否还留存于世暂时未知，上海医院旧址位于上海市黄浦区，查1996版《黄浦区志》，暂无上海医院院长宋克申相关记载。上海北站医院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查1996版《静安区志》，亦无宋克申在该院的相关记载。

查王爱琴《李元晋的小女儿嫁汾阳宋德昌》一文可知，宋克申为民国汾阳巨商宋铭三之长子，娶孝义县最后一位举人、商界翘楚李元晋小女儿为妻，二人结为亲家，堪称门当户对。宋克申的后代如今分布在上海、江西、甘肃等地。相关资料显示宋铭三之父宋金印为汾阳医林四大家之一，是清光绪甲午科举人，宋金印履历记载其始祖为聂生村宋子正，由此可确定宋克申祖籍为汾阳三泉镇聂生村。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突袭上海，淞沪会战打响，无数军民伤亡，战地救护迫在眉睫。宋克申不顾个人安危，秉持“救恤”之初心，第一时间投身救援，面对药品匮乏、医疗设备简陋、空袭不断的险境，宋克申凭借精湛医术救死扶伤，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医者的责任与担当，彰显了乱世之中的医者仁心与民族大义。为表彰其

抗战贡献，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经常务议会共同议决，于1932年6月30日特授予他救护奖章，并颁发证书。兹录证书全文如下：

“案查本年1月28日上海发生战事，宋克申君在抱病兼济众博施之志愿，热心救恤，有生死肉骨之功能，兹经常议会共同议决，特赠救护奖章，以昭激励而资纪念。”

落款为：会长颜惠庆，副会长王正廷、虞和德，证书编号“数字第壹伍贰贰号”。

这份证书既是对宋克申救护工作的高度认可，也是他爱国情怀与奉献精神永久见证。今年7月下旬至11月底，这份证书还在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组织的“铭记伟大胜利 开创美好未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中展出，引发强烈反响。

宋克申留存史料有限，其生平细节仍有诸多待考之处，其一，他就读的北京某医学专门学校很有可能是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即现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其二，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文化战士、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邹韬奋1944年病逝于上海医院，宋克申有没有参与救治等等。

当下，仅凭以上零星记载，已足以勾勒出一位爱国医者的鲜明形象。他以医术为刃，对抗战火伤痛；以行动为证，践行民族大义。如今，回望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宋克申等无数爱国志士的奉献不应被遗忘，铭记他们的事迹，既是对历史的敬畏，更是对后人的激励，愿这种爱国情怀与担当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中国红十字会授予宋克申的奖章证书